

能动的振摆：从新历史主义视野 看新闻文本的历史性

阎立峰 王璇

内容提要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文本是叙事话语，而振摆不仅是主体的日常行为、文本的存在方式，更是能触摸真实的阐释模式。西方的新闻文本也是如此，新闻不是自然之镜，历史性与文本性在开放的新闻报道中交汇，并且作为话语事件的新闻文本反过来会成为塑造社会和历史的重要力量之一。通过借用新历史主义的相关概念，尝试从“新闻记者、文本真实、意义阐释”三个方面辨析新闻文本的历史性。西方记者是兼具能动性 and 屈从性的主体，是社会力量的协商者，他们制作出的文本是权力商讨的产物，在与整个文化系统流通过程中碰撞出共鸣和惊叹。而受众在面对这种有意义的解释时，会将文本中远处的文化与自身的语境相结合，并与其他话语主体交互运动，从而产生新的解释。

关键词 振摆 新历史主义 西方新闻业 历史性

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一种在文学领域唤起历史意识的实践，它依附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一反把历史背景和文学文本隔离开来的传统做法，将两者放在整个文化表述系统中进行考察，并且试图解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新历史主义泛文化形态的视野下，振摆（oscillation）是文本的存在方式，文本的生产和阐释都在不同的话语领域之间穿梭摆动，而这种交互运动为重构历史文化语境打开了希望之门。新历史主义的先驱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也译为葛林布雷）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调和了詹姆斯（Fredric Jameson）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这两个站在相反端点的阐释模式，解释了他所处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背景下的各种话语领域之间的振摆状态，并认为这是人的一种日常行为。格氏所说的振摆，指的是各文本领域之间的界限既存在又消解，是“审美与真实之间的功能性区别的确立与取消同时发生”。^[1]也就是说，一个文本，无论是文学文本、历史文本或者其他类型的文本，它们都不会只在单独的话语空间停留，而是在社会文化等多重领域中自由流动，是沟通商讨的产物。

“振摆”的提出与新历史主义的核心思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 and textuality of history) 是一脉相承的,在该流派那里,历史性不再只是游离在文本之外,而且存在于文本内部,两者相互融通。也就是说,它突破了以往传统观念把历史性看作是文本的背景,把文本看作历史性的结果这种简单的划分,认为两者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塑造的共构关系。目前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和文学领域,鲜少涉及到新闻生产、新闻文本领域。而新闻文本与历史叙述有着相通之处,两者是记录社会现实存在的符号集合,并且都不是浑然天成或者完全封闭的实体。历史性与文本性在开放的新闻报道中交汇,为文本打上了特定的历史具体性和物质性的烙印,并且作为话语事件的新闻文本反过来成为重塑社会和历史的重要力量之一。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凸显新闻文本的历史性:首先,作为文本的制造者,新闻记者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构成,其主体的能动性和社会性交互作用;其次,新闻文本是历史性的,是社会能量流通的场所,是由历史、文化、权力等所塑造而成,同时也是构建历史的力量之一;最后,对新闻的阐释也是历史性的,新闻文本是一个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做出弹性的阐释,而且某一文本会成为阐释其他文本的纽带。新历史主义的视野和方法将不仅使新闻文本从单一话语领域解放出来,认识到它与历史的双向互动,在社会或意识形态等多重领域的振摆中对它进行考察,除此之外,也使我们明了由于语言的非透明性和非指称性,通过新闻文本所触摸的真实是虚幻的真实,新闻工作者作为一种文化构成,其文本也不可避免带着人造品的痕迹,我们在解读它们时不能奢望正在直面全部真相,而是应当保持必要的警觉,在话语实践中捕捉真实事件的折光。

一、记者：两面性主体的自我塑造

新闻文本,作为一套有意义的符号集合,记者和其所在媒介机构塑造着它的日常面相。要探究新闻文本的历史性,首先就要了解其主体——新闻记者的历史性。新闻记者将采访对象、组织机构、读者等串联在一起,是多种社会关系的集合体,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各种社会成规和文化印记隐藏在新闻记者的头脑中,随之不可避免地在其生产的文本中留下意识形态表征的痕迹。对新闻记者主体性的厘清,有助于了解记者是如何将社会事件加工成话语文本,又如何通过这一话语实践达至对社会结构及权力的强化或反抗的。

新历史主义学者把主体问题当作一个理论基础问题给予了明晰的回答。在该流派之前有着两种针锋相对的主体观,一种是作者决定文本,作者至上;另一种是文本决定作者,作者消失。新历史主义并没有采取简单的谁决定谁的理论模式,而是既看到作者的能动性又看到了其屈从性。正如蒙特洛斯(Louis Montrose)所说:“主体这个术语意指主体实现的多义过程。一方面是使个体成为意识的所有者和行为的发动者——即赋予他们主体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把他们安放、行动和压制

在——使他们屈从于——社会网络和文化符码之中，这些网络和符码是根本超出他们的控制的。”^[2]这种屈从与能动成为硬币的两面，主体的历史性被凸显出来。该流派赞成马克思所说的“人必须在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进行实践活动”，又强调主体除了先天的一部分之外，需要在话语中不断自我塑造和动态发展。

新历史主义之所以强调自我塑造，是针对传统观念认为主体是一个静止的封闭实体提出来的，它吸收并改良了福柯等学说的观念，认为主体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发展、建构又解构的动态过程中。另外，主体进行自我塑造这一活动是在多重话语领域实现的（而不是仅仅在一个空间活跃），表现为在多个领域之间穿梭摆动。格林布拉特曾经以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在总统职位上仍然会引用之前出演的电影里的台词这一现象为例，旨在说明他在政治领域和审美领域中来回摆动，两者无法剥离开来。格氏认为，里根的这种行为是由一种深层结构所导致的，“不仅是一个权力、意识形态的极端和军事黩武主义的结构，而且是包括我们为自己建构的快感、娱乐、兴趣空间在内的结构，诸如我们如何提供新闻，我们每天从电视电影中接受虚构的幻想，以及我们自己创造并享用的各种娱乐活动。”^[3]也就是说，这一结构并不仅仅进入政治军事领域，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生产消费的每个层次，生活在一定社会网络结构下的人们，都在这种结构的影响下从事实践。

按照格氏上述所言，西方记者作为提供新闻文本的人，是这一结构的产物，同时也是编织这一结构的参与力量之一。他们从属于一个拥有特定权力的新闻机构，这个机构可以赋予每日发生的事件以一定的意义，通过成文的条规或者不成文的惯例来规定新闻价值的标准，决定了什么是新闻，及该怎么生产出各种不同类别的新闻。记者按图索骥，快速地把新闻事件从日常生活中挑选出来，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源，按照类别进行归类总结，剪辑拼接出事件过程，传递给受众基本的认知框架，进而决定或者影响着受众看世界的视角和视野。

记者的自我在不断的振摆中实现动态塑造，其两面性——主动性和屈从性——非常明显。这两面在新闻生产线上的每个流程都相互作用着，直至文本输出。新闻生产的第一步就是选择要把他的目光投向哪里，也就是决定什么样的事件能登在今天的报纸上。面对每天发生无数事实的日常生活，记者有着“主动权”，他让自己的“新闻嗅觉”或者“新闻触角”来拍板，但他的头脑中这一套关于新闻价值的规定，却正是他身处的权力关系、文化符码等因素的产物。西方新闻生产中的其他环节，如信源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关系的转述；而叙述聚焦乃至遣词用句，则直接体现新闻背后的组织架构的意志。赫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在《什么在决定新闻》里，对1974年某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进行分析，该期刊预测了200位美国未来的青年领袖。让作者感兴趣的，是记者们的信息来源主要为学者、政客——这些都是当时美国新闻中经常出现的声音源。除此之外，该名单里也没有左派领袖，而这似乎是有意为之。^[4]

在新闻生产消费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记者的历史性是关键的中环节。记者在社会话语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审美领域等多重空间表现活跃，非稳定的自我在顺从或反抗这些权力结构的过程中实现建构和消解。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虽然职责使命有别，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两者都是过去发生的“真实事件”的忠实“记录者”。新闻记者无疑是新闻文本的主体，是此类话语实践的制造者，但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活动，也只有在某一社会文化环境下才能发挥能动性，才能达到传播效果，这种社会性是记者主体性的一部分，也突出了记者的历史性。

除了解释主体塑造的动态过程，新历史主义也对文学领域中的作者下了一个特别的定义——一群协合者，即作者作为多方社会力量的中介，需要沟通、协调不同领域的关系。学者杨正润认为这种调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他要把自己从社会生活直接获得的或是通过流通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各种各样的经验材料协调起来，他要把自己的创作活动同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总的状况协调起来，他还要把自己的作品同读者或观众的审美趣味和爱好协调起来。”^[5]文学与新闻固然在对真实的要求方面截然相反——前者是虚构的产物，后者把真实作为第一要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泾渭分明，在新闻文本中甚至此类主体中介作用发挥得更为明显。新闻记者并非一个个体，而是代表集体意志和信仰的集合，他将社会集体意志与事件夹杂在一起编织进新闻中，同时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播说服效果，还要根据受众的信息需求或审美需要调整新闻性和趣味性。当受众接收到这样的新闻后，新闻话语就转变成社会无意识。

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曾经批评美国的记者在报道伊斯兰世界时，划分了一个清晰的“我们”与“他们”的界限，用西方主宰者的身份来看待远方的社会。^[6]其实这种偏颇可以用新历史主义对主体所做的说明来解释，首先，美国记者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存在，他们无法脱离这个国家的文化规约和思维模式，他们是一个深层结构的产物，既有能动性也有社会性，被历史文化大网络及组织机构小网络所塑造和框限；其次，他们是一个集体，带着一个普遍的共识而来，那就是把伊斯兰世界当做“替罪羊”，以转移西方公民对其本国内在机制、制度等的不满，这种集体意识将不可避免地被输入到文本中；最后新历史主义也强调互文性，认为不存在一个自己创造的文本，新闻都是对其他记者的模仿和改良，由此历史循环往复，谁发声谁沉默的传统一直都没有彻底的改变，导致偏差被当作一种共识而继续沿用。这些美国记者协合两种不同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协合两个不同的社会结构，社会能量在不对等的地位流通，记者也在新闻话语中完成自我塑造。

二、文本：无形的真实与有形的故事

新闻和历史虽然有着不一样的研究范式和学科要求，但都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叙述体，人们也总是以反映论来看待新闻和历史文本，认为它们是社会存在的

一面镜子，是对真实事件的机械复制。的确，这两者都把真实奉为圭臬。真实性是新闻的第一准则，是新闻从业者的良知所在，是新闻行业的价值体现。历史同样如此，人们要求史学家秉笔直书，因为这才是其权威性的保证。总之，对新闻文本和历史文本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它们都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历史、社会、文化等是文本产生的背景，文本则是这些外部因素的产物。其二，无论是新闻还是历史，都是对已发生事件的真实描述，文本的历史性要被客观性淹没而成为一种记录，这样才能让不在场的读者了解到世界的真实面貌。上述传统观点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例子比比皆是。如在历史研究领域，沃尔什（William H. Walsh）就认为历史文本中客观存在着某种“过硬的”“坚强的”“给定的”的东西，那就是事实。^[7]

新历史主义对以上两种看法都提出了质疑，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与扎戈林（Perez Zagorin）曾经围绕文本与史料的关系进行过辩论。前者作为新历史主义学者认为历史文本不再清晰，也不再可靠；后者认为真实的史料是文本的限定因素，历史学家要服从这个过去。^[8]可见，新历史主义的“新”在于两点：一、看到了文本与历史的互动，两者并非“一个是背景、一个是产物”的简单关系，而是互相渗透、相互融通的共构关系。二、人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接触到历史；但又否认历史文本的客观性，不认为历史叙事等同于历史过程的记录，由于文本的生产性、非透明性，这种再现本身就是创造性的，不是真实的。于是在该流派眼里，文本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固定不变的实体，而仍然是一个不断与社会网络、权力结构互动的过程。此外，文本是由语言堆砌起来的，语言不是“自然之镜”，它的非指称性和透明性必然不会机械地反映社会存在。安克斯密特曾提出“叙述体”这一概念来强调词语背后的综合意指，例如当文本中出现“工业革命”这种看似中性的词，其实都隐含着过去对这一真实事件的观点集合，并且这些观点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词语并不是先天存在的，也不具有明晰的外围，所以借助于这样的人工品所追求的真实只能是虚幻的真实。^[9]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曾提出，“历史学家发现他的故事”这样的说法会掩盖文本中史学家的主观参与程度。^[10]海登·怀特并不否认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性，但在他看来要把这一无形的真实变为有形的文本时，最后完成的文本却是统一虚构的。历史所追求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与科学并不相同，“是一种适合历史的客观性……有许多不同等级的客观性，正如有很多理性的行为”。^[11]它只是一种话语实践，原本断裂的、非连续性的事件，经过某种理论的包装后，添加了事件之间的联系，抚平了历史的裂缝，最后形成我们能够接近的、披上了真理外衣的文本。

西方新闻业也是如此。人们之所以需要新闻，除了要知道最近发生的事件之外，还想“全面”地了解所处的世界，新闻必须承担起为事件赋予意义的任务，为原本单个发生的社会事件，人为地建立一种因果联系，并按照一定的规则来挑选、加工、

写作，这样的文本自然不可能是对社会存在的真实再现。我们这里所说的“真实”并非是“假”的对立面，而是哲学意义上与摹仿论类似的概念，新闻和历史的任务就在于如何让受众信以为真，把文本中隐含的权力意识普遍化，成为公众的一般意识。

框架是人们认识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所依靠的认知图示，由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提出，同样可以应用于新闻领域。框架是记者快速处理素材的依据，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规定受众选择、构建某一部分现实的深层结构。潘忠党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了有关新闻框架的定义，即“位处特定历史、经济和政治坐标点的社会个体或团体达成其特定理解或意义所遵循的认知和话语的组织原则”。^[12]框架的建构决定着新闻的题材、叙事方式和用词遣句，帮助记者将言语拼接在一起成为话语。新闻记者的框架是由他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编织的大社会和媒介机构的小社会所相互作用建构起来的，面对突发事件时，可以通过一系列程序，在事实的基础上，投入最小的成本将偶然的新闻事件常规化，换句话说，“酒是新的，瓶还是旧的”。“真实”不完全等同于事实，西方新闻记者把事实按照新闻框架包装起来成为“真实”，输出给读者，通过影响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框架来实现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强化作用。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曾说过“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13]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新闻文本。

新闻不仅包含了现实发生的事件，作为公开发表的符号集合，各种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也在其间流通及调和。这种运动可以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前者是不同话语领域之间的沟通，界限被消解，后者是过去的文本中含有对现在的受众发挥作用的力量。正因为看到了这些观念和利益的调和交易的过程，新历史主义认为文本是一种话语实践，参与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进而将文本与历史结合起来，认为文本是推动历史的文本，历史是文本形态的历史，两者不可剥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新历史主义虽不承认历史叙事能实现对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完美再现，但他们并未悲观，认为一个方法能触摸到真实的折光，那就是“轶闻主义”。于是，边缘的、细微的、零碎的文本被推向神坛，备受追捧。这些文本主要指的是文学领域的轶闻，这些轶闻被看作一种表征，是可以通过它们一探文本生产的真实语境的。这些零碎的材料散落在历史的缝隙里，以一种粗糙的方式指引人们，人们可以听到多种声音而非单一的发言。实际上，新闻中也存在各种轶闻，它们多是以带有趣味性的软新闻形式呈现。如果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说法，将这些零碎的边缘的软新闻当作探究新闻文本真实性的必经之路，那么反而无法把握到社会整体面貌，无法对新闻描述是否符合社会存在做出判断，因此，这种触摸真实的做法可能并不适用于分析更为强调即时性的新闻文本。

三、阐释：本质的消失与意义的生产

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承担着一种相同的充满悖论的职责：人们要求他们客观记录真实但又要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做出解释以使陌生的世界熟悉化。解释是主体对文本（无论是事件文本还是狭义文本）的要素重组和意义再造，历史性是解释的起点，任何主体都是从自己个体或集体的相关知识结构和心灵体验等出发对客体进行理解和解读，同时解释又是通往这种历史性研究的道路。以历史为例，通过叙事语言人们能够把陌生的已逝的事物变得面貌清晰，重构过去的历史情景和文化语境，其中有的因素会进入时间长河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进而为我们把握当下的生存状态、社会机制、权力网络等提供帮助。可以说，历史性与解释是如影随行，并肩进退的。因此，新历史主义提出了一个独特的阐释方式——振摆，“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不能局限于历史话语，而必须打破话语领域的界线，使各共时性本文互为语境，互相参照，不断在各个话语领域之间穿行、振摆。”^[14]

阐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除了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做出自己的解读之外，读者面对已经注入史学家视域的文本也会写下自己的注脚。这两个阶段构成了一个持续不断、循环往复的流通的过程，当时的文化与现在的处境相碰撞，文本中的话语与其他话语相融合，从裂缝中寻找真实。海登·怀特看到了历史文本的创造性、历史解释的多样性，也看到了历史话语的诗性结构；作为一名反本质主义者，在他眼里历史的本质已经无法把握，人们拥有的只是对历史事件的虚构的历史叙述文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叙事模式或风格比起内容来说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借此可以更好地看清一个个独立发生的事件是如何被赋予一种联系，纳入到某种叙事结构最后凝聚成历史话语的；在处理证据的方式中则看到权力运作的不同方式。后来者安克斯密特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他对霍布斯（Thomas Hobbes）研究中的“过度生产”现象进行分析后宣称：在历史编纂领域，“简括地说，我们不再有任何文本、任何过去，而只有关于它们的解释”。^[15]以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这个历史人物为例，不同时代的史学家有着不同的处理方式，但由于逝者已逝，其原貌无法直接通过观察来把握，我们只能听到释者的声音，读者以为是为逝者代言的历史文献，其实已被加入了充盈着史学家想象力的解释。

新历史主义把读者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和史学家一样，读者也是历史性的存在，他也有着自己的既有视域和历史语境，在阅读按照一定话语结构编排的叙事文本时，会唤起他的某些知识和体验；不存在超历史的理想读者。新历史主义使用了“共鸣”与“惊叹”这两个审美领域的术语来说明读者、文本、作者、情境之间的运动过程。“共鸣”类似于后结构主义提出的文本间性，是不同的文本之间的融通，社会能量在不同的话语领域中流动，意义在商讨和交易中产生。而“惊叹”主要聚焦于不同的文化表述，突出了历史性，格林布拉特通过该概念来研究欧洲历

史的生产过程。以上两个术语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共同存在于读者的审美愉悦之中”。^[16]

新历史主义关于阐释的观点对分析西方新闻业也有一定的适用性，它可以涉足新闻业的两个环节：一是记者对事件意义的生产，二是受众对流通文本的审视。社会事件的轮廓是模糊的，并不会主动且清晰地显露在读者面前，只能被记者建构出来。记者对事件的再现这一过程就是对它进行解释。就是最标榜“客观性”的西方记者，他的报道中也注入了自己的视域。新闻文本由事件及对它所做的语言解释这两个层次的元素组成；事件并非最为重要，重要的是认识到语言这种表述系统并不是透明的，只有这样，被遮盖的更深层的文化权力结构才能浮出水面。文本流通的过程中，受众在接触到裹着语言外衣的文本后，会审视其中包含的文化，与自己的语境比对，共同性和差异性会在他的阅读活动中来回摆动，生产出新的解释，而这个新的解释又会成为阐释其他新闻文本或者话语文本的中介。

新闻需要人为建立一种联系（不论是潜在的或显性的），好把客观世界中的事件和人放到特定的情境中做出合理的解释，结果是，将发生在其他空间的事件的意义赋予另一个空间的受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认知及行为产生影响。新闻记者在处理每日发生的事件前都有一个前结构，类似于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谓的“前见”。记者从日常发生的各种事件中挑出符合新闻价值的事件作为考虑选项，这种挑选已经代表着对事件价值的理解，接着开展采访活动，在伽达默尔式的“问与答”关系中追寻有关事件的发生和人的境况的答案，然后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未来预计会怎么样”等解释，编码成话语文本。编码方式就像怀特提出来的历史解释的模式，是一种情节编织。对同一社会事件，记者的个人视角和组织文化等将决定他使用哪一种情节模式来阐释。此时报道方式的选择比内容更能说明问题——它是记者个人或集体的认知模型的侧面反映，它将原本无意义的事件放在一个既定的叙事盒子里，排列顺序并压缩成报道者想要的文本，成为社会能量流通的场所。以所谓中国在南海建立“人工岛礁”事件为例，西方媒体总会采取一种“悲剧”或“讽刺剧”的风格来报道，突出其他国家的“不满”和“担忧”。西方媒体风格的背后，总归是其历史性的体现，是西方话语权力运作的产物。

而新闻的受众也非被动的视听读者，伯明翰学派就曾提出受众会进行三种解码方式，其中对抗或者妥协这两种方式突出了他们的能动性，可见受众并不一定会全盘接受记者为日常生活设定好的解释。作为社会能量流通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受众或受众群面对有意义的符码集合时，会将自身的文化语境注入其中，在（对文本中文化差异的）惊叹和（不同文本相似处的）共鸣之间来回摆动，打破记者对社会事件设置的平滑的叙事，于断裂处生成新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又成为构建对其他文本进行阐释的不可避免的材料。

四、结论

如上所言，历史叙述承担不起保证真实的重任，因为它是历史性的主体用语言按照一定的规约制造出来的人工品，新历史主义认为通过振摆这种独特的阐释模式才能触摸到真实历史模样。西方新闻文本也是如此，它不是现实世界的镜子，而是一种话语实践，是传递社会能量的中介。社会能量在记者和新闻机构、不同的新闻报道、读者和他所处的阶层群体中流通，新闻文本不可避免地带有其特定的社会规约，并且成为一种重塑权力结构的重要力量。

西方新闻记者是具有两面性的主体，他是新闻机构和深层的社会结构的产物，他有一定的主动性但也存在屈从性，其自我在这两种性质之间的振摆活动中不断被塑造。新闻文本是新闻事件按照一定框架生产出来的，框架是记者的认知模式和话语原则；同时文本不是封闭静止的，而在不断地与社会文化互动，各种意识形态和权力也在此流通及调和。记者会为社会事件赋予相关联系，而受众面对这一有意义的解释时，也会带入自己的语境来审视语言外衣下更深层的文化结构。在受众的阅读接受活动中，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似处会带来共鸣，而面对不同文化的时候则产生惊叹，这两者相互转换，不断摆动。受众也不是理想读者，是历史性的存在，面对文本会写下自己的注脚，并且成为下一次阐释活动的中介。

作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注释

- [1] 〔美〕斯蒂芬·葛林伯雷 《通往一种文化诗学》，盛宁译，张京媛主编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页。
- [2] Aram Veesser, ed., "New Historicism, Routledge," p. 21, 1989, 转引自张进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 [3] 〔美〕斯蒂芬·葛林伯雷 《通往一种文化诗学》，盛宁译，张京媛主编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 [4] 〔美〕赫伯特·甘斯 《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0-84页。
- [5] 杨正润 《主体的定位与协合功能——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1期。
- [6] 〔美〕爱德华·萨义德 《报道伊斯兰》，阎纪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6-27页。
- [7] 〔英〕W. H. 沃尔什 《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9页。
- [8] 张耕华 《历史的“硬性”与解释的“弹性”——兼论安克斯密特与扎戈林的争论》，

能动的振摆：从新历史主义视野看新闻文本的历史性

《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 [9]〔荷〕F. R. 安克斯密特 《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译者序言，第9-10页。
- [10]〔美〕海登·怀特 《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 [11]〔法〕保罗·利科 《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 [12] 潘忠党 《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6年第1期。
- [1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81页。
- [14] 李清 《振摆——新历史主义文本阐释模式》，《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 [15]〔荷〕F. R. 安克斯密特 《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韩震译，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2005年，第203-204页。
- [16] 张进、刘雪芹 《论新历史主义的读者接受观念》，《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

5 O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National Cyber Power in the New Era

• *Tang Jingtai, Lin Rupe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yber power in a new era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is idea i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laws that govern the interne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t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themes concerning the future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internet ag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ety, the concrete strategy for making China a cyber power, and internet governance. These new ideas are epochal, practical and systematical. They are the latest achievements of Marxis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21 Understanding Social Justice: Media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Perceptions in China

• *Su Zhenhua*

Exploiting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3),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ffect of media construction on public perceptions of social justice. In spite of the relatively large income inequality, Chinese people nevertheless feel that society is generally fair. Trust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the frequency of using mainstream media sourc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mong Chinese people.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public perception of social justice is a consequence of media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dia construction, income levels do not have effects on people's awareness of social justice. In sync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effects of media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n perceptions of social fairness will decline. To maintain the positive public appraisals of social justice, mainstream media need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ow-income citizens, who should be provided with more opportunities and higher incomes.

41 Dynamic Oscillation: The Historicity of News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 *Yan Lifeng, Wang X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historical works can be regarded as narrative discourses. Oscillation is not only the subject's normal behavior and the text's existing mode, but also a kind of interpretative way of touching the truth. Western news text is not a natural mirror. Historicity and textuality are converging. As a discourse event, they turn into an important force that shapes the socie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use relevant

concepts to explain the historicity of news text in three aspects: the journalist,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The journalist is the subject with activity and compliance. As negotiator of social forces, his text is known as the product of power, and brings resonance and wonder in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with the whole cultural system. While facing such a meaningful explanation, the audience will consider the different culture and his own context, and interact with other discourse subjects, resulting in a new interpretation.

51 Opinion Leader Relationship and Subject Participation Tendency: A Coupling Analysis of Weibo Hot Events

• *Wang Hanxiao, Yu Deshan*

In this research, participations of 486 Weibo hot events in 2016 are associated with 325 opinion leaders to build an opinion leaders' event coupling matrix. Using coupling analysis, index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study analyze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visually reveals the activity of opinion lea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ir subject participation tendency.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Weibo's ecosystem has an obvious preference for pan-entertainment and everyday life. Currently, four types of opinion leaders are active in the Weibo ecosystem: (1) opinion leaders in recreation and entertainment; (2) opinion leaders in society and everyday life; (3) opinion leaders in competitive sports; and (4) opinion leaders in finance and politics. Through comparing these opinion leaders as well a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nd different subject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overlaps between opinion leaders of types (1) and (2);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two subjects is relatively high; and in terms of opinion leaders in types (3) and (4), although their subjects may involve other subjects, the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ir subjects and other subjects is relatively low, implying that they only focus on events in their own subject in most cases. This study uses coupling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ext and the user and explore the hidde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ers. Its results may be used for collective behavior identification of marketing accounts, label dynamic division of opinion leaders and grading detection of subjects.

66 Mutual Aid and Storytelling in Wechat Groups: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Wechat Groups of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y

• *Xiao Rongchun*

This paper is an ethnography and case study of mutual aid and storytelling in a WeChat group of immigrant Chinese community. It finds that WeCha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builds a networked community. Continuous mutual actions form weak ties, and generate mutually beneficial social networks. This social networking becomes the marginal man's important resource for living and development. Community members acquire a sense of belonging through mutual aid and storytelling in WeChat groups. This